

“杀人越货”和“夏鼎”

——答罗琨先生

刘 雨

《考古》2006 年第 9 期发表了罗琨先生《利簋“岁鼎”析疑》一文（下简称“罗文”），针对我与何炳棣先生合写的《夏商周断代工程基本思路质疑》一文对利簋的解释，提出批评。

罗文首先从分析“岁”字入手，指出甲骨文岁字有三种写法：𠂔、𠂔、戌，其中𠂔，从步从戌，是岁之本字。𠂔为𠂔之简化，戌为𠂔之再简化，利簋铭“𠂔鼎”即为“岁鼎”。周初“越”无“夺”义，“成语‘杀人越货’是比较晚近才出现的，不能作为释读周初金文的依据，因此利簋铭不能读为“越鼎”。该文又进一步分析，认为“王孙满答楚王问”中的“鼎”是“天命”的代称，文献中所说“周受殷鼎”不过是“周革殷命”的一种表述方式，《世俘》“荐俘殷王鼎”也应是“将殷纣之首放在鼎中献祭”的意思。周初“鼎并没有成为政权的象征，其铭文也就不可能用‘越鼎’表述‘夺取政权’。”

罗文认为甲骨文岁字的三种写法是逐次简化的结果，这个分析是难以成立的。原因很简单，三种写法的字同时出现在甲骨一期。古文字在发展流变过程中，繁化和简化两个过程是同时存在的，把岁字的三种写法简单的归结为逐步简化的结果，并没有多少根据。因为我们不能排除岁字三种写法与罗文分析的相反，是逐步繁化的结果，也不能排除它们本是一个字，只是来源不同的异形写法而已。在没有确切的证据之前，很难说谁是本字。因而对利簋铭来说，“岁鼎”、“越鼎”一为张政烺先生说，一为唐兰先生说，从字形上看，不存在优劣之分，都可以成立。但在释义上我们认为张说存在一定困难，即我们文章中所说“退一步讲，即或可以释为岁字，是释

为‘岁星’还是释为‘岁祭’仍难以确定。再退一步讲，即或把‘岁鼎’讲成‘岁星当头’它与‘岁在鹑火’也不是一回事。”

罗文特别批评我们引用“杀人越货”这一成语。“杀人越货”一语来源于《尚书·康诰》“杀越人于货”以及后来《孟子·万章》对《康诰》这句话的征引，这大概是没问题的。但对这句话的理解，却存在许多歧说，特别是对其中“越”字的解读，众说纷纭，影响较大的如罗文所引汉代赵歧注《孟子》所说的“‘越’、‘于’皆‘于’也。杀于人，取于货，闵然不知畏死者……”，伪《礼记》释为“杀人颠越人以取货利”。“杀人”本来是很明白的话，古人为甚么要说成“杀越人”或“杀于人”呢？至于“杀人”又“颠越人”就更难理解，一般人在被杀时，很难站立而不“颠越”，古人说话何苦这么累赘呢？类似的解释还有许多，象章炳麟《古文尚书拾遗定本》：“杀人、越人，有操金刃、仗白挺之巽。”牟庭《同文尚书》：“越人者，过人也，谓过路人也。劫杀过路人，求索货泉。”这些强为之解的解释都难以讲通经义。对这段经文讲得比较好的是宋代人吕祖谦，他把“越”讲成“夺”：“如盗贼奸恶，杀夺人财货，刚强勇悍，又不畏死……”（《东莱书说》吕祖谦撰，时谰修定，见丛书《通志堂经解》）。至于“越”何以可以讲成“夺”，唐兰先生认为是音近假借。他在解释利簋“越鼎”之“越”字时说：“此处当读为夺或斂，戌与夺音近可通用，《孟子》：‘杀越人于货’是说‘杀人夺货，’可证。此说‘戌鼎’即‘夺鼎’。”（见《西周青铜器铭文分代史徵》第 8 页注 3），所以我们认为，

后代人把《尚书·康诰》“杀越人于货”理解为“杀人夺货”，造出“杀人越货”的成语，并没有错，倒是那些历代强为之解的解释，包括罗文的解释，却远离了《康诰》原意。

罗文还认为在周初不存在以鼎为政权象征的意识，对文献中出现的各种关于“夏鼎”的记载，大都做了新的解释，读起来觉得未免牵强。别的且不说，罗文在讨论这个问题时，使用的材料就带有很大片面性。该文引用了《左传》宣公三年、桓公二年、《战国策》、《逸周书·世俘解》、《史记·秦始皇本纪》等资料。可是《逸周书》的《宛殷解》说：“乃命南宫百达、史佚迁九鼎三巫”作者怎么不引呢？《史记·周本纪》说：“命南宫括、史佚展九鼎宝玉。”“成王在丰，使召公复营洛邑，如武王之意。周公复卜申视，卒营筑，居九鼎焉。”“太史公曰：‘学者皆称周伐纣，居洛邑，综其实不然。武王营之，成王使召公卜居，居九鼎焉。’”作者怎么也不引呢？很明显，这几段话中的“九鼎”是不可能用“天命”或“将殷纣之首放在鼎中献祭”等说法来解释的。罗文可以引《逸周书·世俘解》和《史记·秦始皇本纪》，却不征引《逸周书》同书的《宛殷解》和《史记》同书的《周本纪》，这说明作者不是不知道有这样与自己论点相反的材料，这些材料能有力地说明周初就有“以鼎为政权象征的意识”，而作者却故意把这些不利于自己观点的材料“一漏了之”。

罗文用来证明其“周初不存在以鼎为政权象征的意识”的论点，有几个重要论据：1. “‘周受殷鼎’不过是‘周革殷命’的一种表述方式”。2. 王孙满答楚子问，“其所论，与其说是承载了天命的‘鼎’不如说‘鼎’是‘天命’的代称”。3. “‘荐俘殷王鼎’也应是‘将殷纣之首放在鼎中献祭’”。

“周受殷鼎”据《周本纪》记载是武王伐纣之后，武王命管蔡监殷、释箕子之囚、表商容之间、散鹿台之财、发钜桥之粟、命南宫括史佚展九鼎宝玉、封比干之墓等一系列政治举措之一，这些都是很具体的政治行为，这里的鼎或九鼎无论如何也难以用“天命”或“‘周革殷命’的一种表述方式”来解释。

至于《左传》桓公二年、宣公三年记“武

王克商，迁九鼎于雒邑”、“成王定鼎于郊”记录的是“周受殷鼎”后，鼎的具体去向。

“王孙满答楚子问”中，楚子所问当然是鼎之具体大小轻重，因此才引出王孙满回绝他觊觎王权意图的精彩言辞，这与“天命”也不相干。杨伯峻先生《春秋左传注》云：“鼎即九鼎，已见桓二年传并注。《周本纪》谓‘楚庄王伐陆浑之戎，次洛，使人问九鼎。’”明谓此处的鼎就是九鼎，也就是文献中所说的“夏鼎”。

罗文把《世俘》“荐俘殷王鼎”解作“也应是‘将殷纣之首放在鼎中献祭’”更是牵强。《世俘》讲到这一段历史时说：“武王在祀，太师负商王纣悬首白旗，妻二首赤旗，乃以先馘入，燎于周庙。”《周本纪》有“以黄钺斩纣头，悬大白之旗”的记载，两文所记，如出一辙。司马迁没有见过《逸周书》，这是两个不同来源的史料合在了一处，绝非巧合。不知罗文“将殷纣之首放在鼎中献祭”的记载，来源于何处？也不知周初是否有将人头放在鼎中献祭的仪礼。同是《世俘》的记载，按罗文的解释，要先“荐俘殷王鼎”即把“殷纣之首放在鼎中献祭”，又把“商王纣悬首白旗……燎于周庙。”似乎纣有两个头颅了。

“克殷”是周初的头等大事，所以文献记载特别详细，《逸周书》据云是汲冢出土的古书之一，对《世俘解》、《宛殷解》所记史实，史学界是肯定的。写《左传》的左丘明、写《史记》的司马迁都是十分严谨的史学大家，没有根据的史料他们是不会轻易采纳的，所记史实必有可靠的来源，不会以向壁虚造的史料来记叙周初这一段重要历史。退而言之，即或认为《宛殷解》和《周本纪》所记不可靠，也应找出相应的反面史料加以说明，来证明自己的论点，怎么能以有意回避的作法误导读者呢！上述史书如《左传》、《史记》、《逸周书》等对九鼎亦即夏鼎的记载是一贯而明确的，不难看出，罗文这几个论据，都曲解了文献原意，看不出有甚么新的文献和史料的根据，也不见有哪个注疏家有这种解释。

罗氏在另一篇文章中，还要我们拿出周初的史料来与其讨论，才能使其认可。按说，论者提出一个新的观点，推翻以前的成说，要自己去找到可以否定传统论断的史料，以确定自己观点的

合理性，新说才算成立。而罗文的作法是谁不同意我的观点，你就得拿出周初的第一手文字资料和我讨论，拿不出来，你就得承认我的新说。你要说《史记》《左传》《逸周书》这些严肃的史书都不约而同的有明确的内容统一的关于夏鼎的记载，罗氏就会说，那些材料都是经后人加工过的，因此不能相信。按罗文的这种逻辑，除金文甲骨文之外，就没有可用的史料了，因为几乎所有的我们今天能看到的古代传统文献，都经过了后人的整理和编辑。

应该说古文献对“夏鼎”存在的记载是肯定的、明确的，问题倒是到目前为止，被认为是夏代都城之一的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出土的多是爵、斚、戈等小件铜器和兵器，此地考古发现的青铜器还无法证明文献中这个记载的存在。但在二里头的考古发掘中，大型的堪称夏王室的墓葬

尚未发现，又有谁敢断言，从此以后，在中国古老大地上，不再可能出土夏代大型铜器，去印证古文献中那么肯定一致的记载呢。

通观罗文，只是针对利簋铭中“岁鼎”两个字的理解展开批评，其实我们文章中已申明，可以退一步同意“岁鼎”这个释读，这并无关主旨。罗文所要批评的并非我们文章的核心内容，本来对这样一个枝节问题，我们可以不予回答，但读过罗文后，觉得该文和有一些人讨论问题的方式有一个共同特点，那就是自己立论可以很随意，甚至不需论证，而对别人的意见，却吹毛求疵。在学术上这种高人一等的作风，并不利于学术的发展，也不利于作者本人的进步。

有鉴于此，还是写了上述的话，回答罗先生。

(责任编辑 张鹏程)

(上接第 95 页)

- ③韩愈《石鼓歌》：“忆昔初蒙博士征，其年始改称元和。”《旧唐书·韩愈传》：“为连州山阳令，量移江陵府掾曹。元和初召为国子博士。”《二十五史》，浙江古籍出版社，1988年5月，第4册，第287页。
- ④⑤⑥⑨⑩⑪⑫⑬韩愈《石鼓歌》，《全唐诗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95年11月，总第841页。
- ⑦《石鼓歌》云：“周纲陵迟四海沸，宣王愤起挥天戈。大开明堂受朝贺，诸侯剑佩鸣相磨。蒐于岐阳骋雄俊，万里禽兽皆遮罗。镌功勒成告万世，凿石作鼓隳嵯峨。从臣才艺咸第一，拣选撰刻留山阿。”韩愈把石鼓文说成是周宣王时代的石刻虽然是错误的，但他把石鼓文的内容跟古代史联系起来，证明他已认识石鼓文的内容反映一定的古代史实，具有一定的史学价值；他认为石鼓文字跟周宣王时的大篆是一个体系，故吟出“字体不类隶与科”的诗句，已经认识到石鼓文较高的文字学价值；《石鼓歌》又云：“陋儒编诗不收入，二雅褊迫无委蛇。孔子西行不到秦，掎搯星宿遗羲娥。”认为《诗经》的《大雅》、《小雅》没有把石鼓文收入进去，是摘了星星，弃了日月。拾了芝麻，丢了西瓜。是编诗人目光短浅。认识到石鼓文有很高的文学价值。
- ⑧《石鼓歌》云：“年深岂免有缺画，快剑斫断生蛟鼉。鸾翔凤翥众仙下，珊瑚碧树交枝柯。金绳铁索锁纽壮，古鼎跃水龙腾梭。”以生动巧妙的比喻，对石鼓文的书法艺术给予高度赞誉和评价。
- ⑨刘昫《旧唐书》，《二十五史》，浙江古籍出版社，1998年5月，第4册，第285页上。

- ⑮⑯欧阳修《集古录跋尾·石鼓文》：“郑余庆置于庙而亡其一。”同①，第1098页。
- ⑰郑樵《石鼓音序》，《丛书集成初编》1515。
- ⑱⑲薛季宣《岐阳石鼓记》，《四库全书》1159·499。
- ⑲窦蒙《述书赋注》，《丛书集成初编》1515。
- ⑳㉑王厚之《复斋碑录》，王昶《金石萃编》，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，1990年12月，第1卷，第5页下。
- ㉒张师正《倦游录》，吾衍《两秦刻石释音》，《丛书集成初编》1515。
- ㉓梅圣俞《雷逸老以仿石鼓文见遗因呈祭酒吴公》，《四部备要·宛陵集》，第59卷，第250页。《全宋诗》，北京大学出版社，1991年7月，第3285页。
- ㉔程大昌《雍录》，中华书局，2002年6月，第205页。
- ㉕都穆《石鼓文辩证》，冯亦吾《书法名论集》，河北美术出版社，1993年8月，第181页。
- ㉖唐兰《石鼓年代考》，《故宫博物院院刊》1958年第1期，第13~14页。
- ㉗薛尚功《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》，中华书局，1986年5月。
- ㉘施安昌《唐代石刻篆文》，紫禁城出版社，1987年4月。
- ㉙郭沫若《石鼓文研究》（与《诅楚文考释》同本），科学出版社，1982年9月，总第30~32页。
- ㉚薛延年《钟鼎篆韵》，于敏中《归田旧闻考》，北京古籍出版社，2001年2月，第2册，第1155页。
- ㉛王襄《题石鼓》，唐石父、王巨儒整理《王襄著作选集》，天津古籍出版社，2005年1月，下册，第2055页。

(责任编辑 李自智)